

中央苏区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

■朱红建 冯留建

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传统。中央苏区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坚守党员的理想信念和为民担当的政治本色,校正不良政治生态的发展取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价值系统;在斗争实践中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打造高质量的政治生态用人环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主体系统;建设“廉洁政府”,树立优良作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行为系统。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功实践,也为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5-002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研究”(20ZDA022)

朱红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冯留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使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将“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列为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党内政治生态从建党之日就已存在,它是“历史的结果”,具有客观存在性。解决党内种种问题、全面提升政党质量都离不开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生态主体系统、环境系统、行为系统和价值系统等子系统。中央苏区自1929年1月初开始创建,到1934年10月红军主体被迫长征离开中央苏区。这一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始终坚持系统推进、综合治理的原则,最终实现了“真正的廉洁政府”。

一、坚守党员的理想信念和为民担当的政治本色

坚定理想信念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是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的价值要义。思想建党是党建之源。中央苏区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系统,从思想建党着手,从理想信念出发,坚守政治本色,彰显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生态价值观。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和性质宗旨。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一个理论的价值取向回应的是对谁负责、为谁服务、让谁满意的问题。价值取向具有决定、支配主体价值选择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回应的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要。

坚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价值理念。苏维埃政府的职责是积极有效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目标主体、评判主体和受益主体。在中央苏区,人民群众主要包括工农、红军士兵和所有劳苦大众。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2](P139)},要深切关注群众生活,“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还首创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民生理念。^{[2](P138)}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底线。“一切为了人民”深刻诠释了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主体和价值内容。“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解决苏区人民吃穿住的生存需要,就是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期待,把保障人民权利贯穿在整个政治生态建设中。在政治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民主专政政权,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改变经济民生。在文化上,党和苏维埃创办多所学校,改变苏区文盲状况。在生活上,毛泽东带领军民挖水井,饮水思源,解决群众饮水问题。“一切依靠人民”是人本理念的具体实践。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心向百姓、情系人民。毛泽东从方法论高度强调群众蕴含的巨大力量:“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2](P139)}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行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彰显人民性,强化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央苏区人民当家作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权归人民所有。苏维埃国家根本法最大原则之一就是“真正实现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使政治的权力握在最大多数工农群众自己手里”^{[3](P223)}。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4](P650)}这就从法理上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二是权力由人民赋予。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主要通过民主选举将权力赋予苏区各级政府。《宪法大纲》规定:所有年龄在16岁以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组织多次民主选举运动,通过民主选举,清除出苏维埃政权中侵害群众利益的寄生虫。三是权力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发挥群众的磅礴力量,惩处贪污浪费行为,反对官僚主义,保障群众权益,站稳群众立场,推动革命形势向积极方向发展。四是权力受人民监督。苏维埃中央政府设立控告局和控告箱,开辟群众控告的渠道,开展群众检举运动,发布《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成立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等组织,加强监督力度。

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民生理念的探索和民生实践的深化,彰显了苏区群众的主体地位,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发了苏区党内政治生态的强大动力。

(二)坚定星火燎原、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净化党员个体思想观念。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坚守星火燎原、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信念支撑。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队伍在政治和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出现城市与乡村的方向张力和

“左”倾与右倾的路线张力。党和红军遭遇“唯上论”错误思想的干扰,一些“左”倾思想的人坚持“城市中心论”。一些不坚定分子对革命形势持悲观态度,思想上犹豫彷徨,担心“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当时,红军、地方党内甚至是中央“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2](P100)}。为消除革命发展中的思想障碍,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悲观论”,解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批判“城市中心论”,明确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必要和现实的选择。毛泽东辩证准确地估量了革命整体形势、革命力量以及反革命力量,以正确的理论,即“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2](P98)},批判“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2](P97)}的错误思想,指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不远了。引用“星火燎原”的俗语,是毛泽东对革命光明远大前途的坚信,也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和光明的革命前途展示给全党全军,激励着革命者矢志不渝。毛泽东在精神层面给予全党感性的激励,以革命胜利的曙光激发同志们“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革命信念。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持“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信念和民族大义,带领人民扛起解放人民的旗帜,肩负起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任,一次次打破国民党的“围剿”计划,在实践中成为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向导。中国共产党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农村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

(三)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

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是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的过程。党员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力量,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需要全体党员的共同推进。领导干部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领导者和“核心因子”,领导干部更要接受理论熏陶和思想教育,确立科学世界观,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是加强理论修养和政治修养。中央苏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熏陶和思想教育主要通过举办“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4](P633)}进行。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学校经常邀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和苏区领导人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方针。1932年3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第6号令,规定苏维埃政府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同年,江西省委以及各县县委都积极、频繁地办短期训练班,为一些地区输送人才。培训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33年,苏维埃大学在中央苏区成立,张闻天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苏维埃大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育学生同志”^{[5](P333)}。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也规定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训练和教育大量中小学校老师,奠定苏区教育牢固和可靠的基础。学校系统的教育,不仅使广大学员提升了理论水平、知识素养,坚定了理想信念,还为预防理想信念滑坡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强调:“我们应当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的水平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的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6](P2744)}中央苏区开始有针对性地突出理想信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二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苏区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斗争》等刊物宣传先进典型,让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地学习先进典型,不断提升自身党性修养。苏区干部好作风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准则。三是强化业务修养。苏区大多数党员干部专业能力不高,为培养专业技术干部,中央苏区还建立了专门的干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例如,创办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银行专修学校和商业学校等,为苏区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型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党员、干部在科学理论学习教育中铸牢理想信念,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党性修

养,打造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合格主体。

二、在斗争实践中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

全体党员干部是政治生态的主体性要素,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在政治生态建设上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选人用人导向正确,政治生态的用人环境就正气充沛、风清气正,党内政治生态的纯洁度和质量就高。中央苏区时期,干部人才异常缺乏,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苏区党组织明确干部选拔标准和条件,在斗争中大胆选拔、锻炼提高干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主体系统。

(一)明确干部选拔标准和条件

干部在动员革命群众和贯彻军事指令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中央苏区时期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党对于干部选拔的政治属性和纪律要求。

干部选拔体现“干部工农化”。中央苏区时期,一方面,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政治纯洁性,另一方面,也因为起初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提拔和培养工人成分的干部,做得非常不足”^{[7](P812)},在新的作战环境和艰巨任务下,亟须保证“红军中主要干部成分要是工人雇农贫农以及在战斗中表示最勇敢忠实的革命战士,应尽量提拔和吸引进来”^{[7](P813)}。193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干部的提拔和调动有严格的规定和一定的标准,“首先就是要按照社会成份及政治的坚定性”^{[8](P344)}。这里的“社会成份”,主要还是向“工人雇农开门”。1931年8月31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要引进新的斗争分子以加强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特别是工人雇农的分子”^{[8](P371)}。1932年9月,《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也明确提出:“在干部的选择上,必须勇敢的引进阶级意识坚定的、政治上坚定的分子,特别是工人干部。”^{[9](P216)}

干部选拔除了要求“干部工农化”,还有其他条件要求:“第一注意其阶级的出身,及其阶级意识的浓厚,不反土地革命者而积极拥护土地革命者;第二工作的积极能艰苦耐劳者;第三有活动力量者。”^{[10](P210)}闽西苏区和赣西南苏区选拔干部的标准大都以此为条件,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干部最后多走上各级领导机关岗位。例如中央政府劳动部长邓振询,工人出身,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贫农出身的钟循仁,1927年入党,经过培养选拔成为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这些高级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都是苏区经过训练提拔培养出来的。

注重民主选拔,坚持群众参与。《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一般的情形,以后地方党委委员会和红军各级的党务委员会的产生,非在特别情况下,均须由党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经上级党部批准。”^{[4](P632)}毛泽东在《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中指出,“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11](P501)}。也就是说,苏维埃的干部是由苏区民众通过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选举产生的。这样,不仅能撤换不合格的干部,也能将“表现最积极最坚决的分子”“贫农中农的积极分子”^{[12](P908)}选举出来,从而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二)在斗争实践中培养选拔干部

好干部的成长既需要自身努力,也要靠组织培养,要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在实践中锻炼。

在实际工作中增长知识才干、锻炼提高干部。1930年2月28日,在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一条关于“创造干部”的方法,“调活动份子到指导机关参加实际工作”,“特别召集活动份子开讨论会,讨论通告,政治分析及工作方法等”。^{[9](P585)}《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新干部“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4](P633)}。这些新干部不能仅做杂事,还

要能够独立地解决问题、处理事情。

在巡视中提拔干部。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党员还要参加巡视工作。1931年5月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指出,巡视员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深入下层和支部,完成“教育和提拔工农干部的任务”^{[4](P375)}。1931年8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也提出要把干部问题作为巡视员的其中一个重要任务,还强调“巡视制度,应该是发现下层干部,提拔下层干部的最好方式之一”^{[8](P346)}。张闻天在《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中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下面,要有巡视委员会这个组织来加强集体领导。在巡视的过程中除了发现新干部,巡视员自身也在实际工作中接受教育,独立地解决问题,增长知识才干。中央苏区的巡视制度对提拔、培养干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建设“廉洁政府”,树立优良作风

建设“廉洁政府”和树立优良作风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环节。中央苏区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内出现浪费、贪污、以权谋私等贪腐现象,党和苏维埃政府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着力培育党内廉政文化,树立优良作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系统。

(一)依法反腐肃贪,严惩腐败分子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治标入手,在开展节省运动、惩腐肃贪工作以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为革命斗争与战争清障开路。

开展节省运动,支援革命战争。“浪费是变相的贪污。”1932年,《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发展生产,节约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号召各级政府和群众全体要节俭,拒绝浪费。同日,还刊登《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指出一切工作要以积极向外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要大力发展生产,开展节俭运动,及时为红军提供给养。此后,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作出光辉榜样。中央党政机关也率先响应,降低办公费用和工作人员伙食标准,裁简非必要工作人员,减少政府开支。

开展惩腐肃贪工作,惩戒贪污浪费的行为。腐败是政治生活中的“顽疾”,官员腐败映射官场生态,要严抓领导干部,严查贪污腐败官员。项英在《反对浪费 严惩贪污》中指出,“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是破坏革命战争”,还强调:“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都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13](P120)}为了震慑腐化堕落分子,中央苏区处决贪污腐化分子——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生,打响了反腐肃贪第一枪。严厉查处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于都集体腐败案等大案要案,有力地敲响了苏区党政干部反腐警钟。颁布首部比较完整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的相关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为苏区司法机关打击贪污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反贪污浪费斗争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反腐败要与反官僚主义相结合。官僚主义存在的程度也反映了党风、政风和社风。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严重影响了革命斗争,阻碍了政治动员,我们党要一刻不放松地与其进行斗争,将其消灭。1933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官僚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2](P124-125)}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任何脱离群众,不明了群众情形,不迅速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不从群众的广大的动员去进行苏维埃工作,而只凭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应该遭受最严厉的打击。”^{[14](P179-180)}因此,中央苏区提出转变工作方式,建立集体的新的领导方式,加强集体领导,“同包办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做有力的斗争”^[15]。把旧的包办主义的领导方式转变为新的具体切实的领导,上级领导不仅能了解下面党

的以至群众斗争的切实情况,还能更加充分地听取下级党部的意见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

(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思想层面上的客观反映,具有价值导向、行为约束和环境净化作用。廉政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纵观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形势和任务,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反腐倡廉运动中以舆论宣传为先导,以廉政教育为主渠道,以廉政制度为保障,培育红色基因,塑造廉政文化。

以舆论宣传为先导,利用报刊、书籍、标语、墙报等信息平台进行反腐倡廉的文字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墙上贴“反对一切贪污腐化”等标语,创办《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等报刊,及时刊载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案件线索和重要成果等内容,向苏区干部、群众注入红色基因,以此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建设廉洁政府的良好氛围。苏区创办的报刊秉承“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16](P180-181)]的理念,成为宣传的好教材。在宣传活动中,党和苏维埃政府坚持站在群众的视角贴近群众,还将歌谣、口号和戏剧等作为廉政舆论宣传的载体,通过大众化的传播,增强党员干部和苏区群众的廉洁意识。例如,中央苏维埃剧团编排的戏剧《大铁锤》,既讽刺、打击了潜藏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贪污腐化分子,又达到了让苏区群众趋廉避贪的效果。

以廉政教育为主渠道,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让党员干部因觉悟而“不想”,解决腐败动机问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将廉政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建立干部培训学校,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教育等,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与领导干部垂范相结合,积极表彰廉洁自律意识强的好干部,通过树立正面典型,发挥领导干部榜样示范教育作用,强化廉政文化导向功能。1934年3月20日,《红色中华》刊载了一封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响应节省运动的亲笔签名信,在节省运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信中说,他们是从白区来到苏区的工作同志,没有分田,但为着革命战争,为获得彻底的胜利,他们“愿意: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17]。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使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中央苏区建立群众性民主监督机制,通过悬挂控告箱、组织突击队、设立工农通信员,使党员干部在群众监督下强化自律行为,增强自律意识。

以廉政制度为主保障,制定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以法保廉,监督促廉,确保反腐倡廉能够依法进行。在宏观制度方面,中央苏区时期先后出台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中央巡视条例》和《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等反腐败法规,建立了党内监察机构、苏维埃监察机构和审判机构等。在微观制度方面,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财政法规和审计法规,建立了审计、预算和决算等财政制度,通过严格财政纪律,在经济层面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浪费现象。

(三)树立优良的作风

优良的作风是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环境保障。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在苏区孕育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通过优良作风克服党内不正之风,以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廉洁清明、务实为民的政治新风。

推崇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调查研究过

程中,必须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向注重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在调查活动中有力地批评了“本本主义”,并坚决与不切实际的想法作斗争。1930年5月至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做过多次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兴国调查》等调查报告。为反对党内和红军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在文中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P109-110)}

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力量源泉和行动遵循。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和红军除了打仗之外,还担负着唤起、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觉悟的重大任务。一方面,宣传群众、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深入群众中,通过标语、宣言和布告等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表达,解说我们党和红军当前的政策、革命任务。在动员和教育群众时从农民切身的问题着手,深入基层,多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关心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在中央苏区,我们党是通过动员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P136)}。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大会召开时指出,群众生活中的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柴米油盐问题、读书问题、生病问题等,我们党都应该注意,“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2](P138)}。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各项工作中,把人民呼声作为评价标准,把“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行动自觉。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中央苏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为节约经费、共克时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带头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胡海、刘启耀等领导人带头自带干粮去办公,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人带头勤政廉政。苏区党员干部以廉政清明来严格自律,焕发清廉有为、担当实干的精气神。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还开展反腐肃贪运动,颁布相关训令,出台惩治标准,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勤政廉洁,打造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就是“导向”,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他们在思想、工作、精神等方向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苏维埃政府规定领导干部要做到“十带头”“四模范”,为广大群众和党员发挥“榜样示范效应”。苏区政府还树立典型,表彰苏区模范干部,以模范典型的无私奉献、朴实工作的优良作风感染周围的群众。

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党的纪律和规矩,主要发挥着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的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时期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划清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和规矩红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行为系统。

(一)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29年1月根据形势发展和红军革命实践,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而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第一次以军规的形式强调了军队的纪律问题,确立了红军建立初期开展革命活动的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红军有了纪律才能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言简意赅,但它是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建设的政治要求,这也是其政治纪律内涵的重要体现。其中,“行动听指挥”是对工农红军提出的行为准则,要求红军官兵、党员干部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循上级的命令,服从党的指挥,紧跟党的步伐,内部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其他具体要求也体现了红军

官兵绝对服从党令军令的纪律意识。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纪律不仅加强和规范了广大红军官兵的政治行为及言论,还从政治上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军事原则,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党令率领军令,保障了早期革命活动的政治方向。“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严明、通俗易懂、具体而有针对性的纪律规矩,整顿了红军队伍思想混乱、纪律松弛等不良习气和作风,人民军队逐渐走向正规化。

(二)古田会议确立了政治原则及纪律规矩

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18](P208)}。古田会议最早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并将其放在突出位置。古田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堪称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典范,毛泽东批评了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和关于非组织观点,要求“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主张“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19](P728-730)}。

古田会议决议还明确了关于组织原则、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政治规矩,推进了领导层的“意志统一”,纠正了红四军党内的“不规矩”现象,为党内生活中的诸多不规范提出了新的科学的规范。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治规矩,“‘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党内批评‘政治化’和‘科学化’、入党条件具体化等”^[20],促进了红四军的团结。第一,“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在决策前,要了解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的情况,然后形成统一的意志,将正确的决策、指示传达下去。二是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要坚决执行决议。第二,“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21](P89)}。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这一规定只是要求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未指明下级层面的诉求。古田会议规定“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一方面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必须拥护和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另一方面要求开会以得到明晰的结论为目的,当时不能解决有争论的问题,可以进行二次解决,也就是说决议形成前要慎重、不能敷衍。古田会议的这条规矩,既纠正了单向度强调下级执行上级的政治规定,又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第三,党内批评“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之前,党内存在“非组织的批评”,甚至还出现了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批评方式,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批评不是毁坏个人、毁坏党的组织,是为了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坚强党的组织的武器,所有的批评应在党的会议上进行,批评还要注意方式、方法,教育党员要有证据地进行客观主义的批评,要经过调查研究,防止主观武断、盲动和空想。第四,入党条件严格化、具体化。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四军党组织松懈,党员质量不高,许多党员不够资格。提高党员质量,首先要解决入党条件,将入党条件严格化、标准化。其次,支部还要对入党人进行考察,看是否合格。

五、现实启示

探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历史实践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央苏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成功实践,至少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为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深刻的启示。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发挥思想价值引领作用

思想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旗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建党着手,从坚定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出发,以学校、训练班为平台使党员干部接受政治理论熏陶和思想教育。新时

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汲取中央苏区时期的成功经验,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思想价值的引领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与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价值导向高度融合。“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21][P19]}要常态化开展党的教育实践,讲好“四史”故事,弘扬革命文化,自觉抵制不良政治文化,增强党员干部政治定力。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以党内政治主体为关键要素

政治生态源于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和状态。中央苏区时期,党员、干部在科学理论学习教育中铸牢理想信念,明确干部选拔标准和条件,在斗争中大胆选拔、锻炼提高干部。新时代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通过经常性的教育,使党员干部经受住各种赞誉、诱惑和风险考验,增强政治主体的思想自觉。“关键少数”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要切实起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还要激发其自我约束的内生动力,强化政治主体的行为自觉。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以党内政治文化为软性支撑

党内政治文化能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熏陶和滋养,可以祛除阻碍良好政治生态形成的文化病根。中央苏区时期,舆论宣传工具较简单,党和苏维埃政府利用报刊、书籍、标语、墙报等方式进行文字宣传,利用歌谣、口号和戏剧等大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新时代要创新党内政治文化的话语宣传体系,在大众化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要把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结合起来。既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一致,又要自觉抵制庸俗腐朽、封建糟粕的政治文化,坚决抵制不正之风。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保障

党内法规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央苏区时期,为打击和震慑腐化堕落分子,警示和教育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中国共产党加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制度、财务公开制度等制度建设。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以党内法规制度为刚性约束,完善党内监督法规,建立健全党内纪律法规,建立党内法规学习教育机制,确保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常抓不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整顿与重塑党内风气。

(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方法

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科学。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基本原则,将系统思维方法运用到净化政治生态中,既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又抓关键。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价值系统、主体系统、行为系统和环境系统等要素是影响整个系统健康运行的因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发挥这些要素的积极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耦合,以实现结构功能最大化。还要关注党内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保持党群、干群关系和谐。

总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敢于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勇于打扫和洗涤自身沾染的“灰尘”,敢破敢立,从深处进行自我净化,以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政治生态治理与党的各项建设息息相关,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协同治理破坏政治生态的多种污染源。

[参考文献]

- [1]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N].人民日报,2023-01-10(01).
-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张闻天文集: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 [6]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 [7]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9]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 [10]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2]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 [13]项英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5]洛甫.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J].斗争,1933,(2).
-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17]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N].红色中华,1934-03-20(3).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0]王毅.政治规矩视域下的古田会议[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1).
- [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王立霞】